



茶铺,是成都人对茶馆的称呼。清末以来,“坐茶铺”成为成都人悠远绵长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悠悠岁月里,它如同一位静静守望在街角巷尾的老友,陪伴着生老病死,见证着世事沧桑。

成都茶铺:氤氲着时光、人生与家国

壹

一城居民半茶客

1949年10月的一天,一位来自瑞典的青年坐在成都春熙路上的一家茶铺里,对着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讲述着他的见闻。好奇的人们将他围着,看着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对外国人对着一台机器自说自话。

他中文名叫马悦然,1948年8月,在学习了两年古汉语后,他远渡重洋来到四川。此后的两年中,他四处奔走调查四川方言,为日后完成有关中国西部方言的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他还邂逅了一位美丽的成都姑娘,成就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佳话。许多年后,他成为瑞典学院院士、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,是其中唯一一位深谙中国文化、精通汉语的汉学家。

马悦然寄居四川的20世纪40年代末,成都人口50万,茶铺有598家。民谣云:“一城居民半茶客。”无处不在的茶铺曾是他捕捉方言韵律、观察市井生活的一扇窗。

72年后,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的帮助下,记者从瑞典国家电台获得了这段声音档案。穿越遥远的时空,茶铺里的烟火气扑面而来——

“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,大约有50米长,20米宽,我估计客人大约有400多……中国茶馆是个非常好的设施:在那里你可以聊天,谈论政治,或者做生意。你可以理发,刮胡子,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……卖东西的小孩在茶馆里穿梭,他们卖花生、炒坚果、瓜子……大多数茶客穿着长衫,从旁边扣扣子……但也有若干人穿西服……”马悦然的声音之外,茶铺里人声鼎沸,茶铺外车水马龙。

王笛在著作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—1950》中,引用了这段记录。这位出生于成都的历史学者,一直致力于微观角度“为民众写史”。在他的研究中,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,几乎没有其他机构能像茶馆一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,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茶馆。在他看来,茶馆是社会的细胞,能折射出社会的复杂和变化多端;亦是一扇窗口,透过它可以观察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。

茶馆之于成都人的重要性,从作家张恨水流寓成都时所写的《蓉行杂感·茶馆》中可窥一二:“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,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(兼菜摊),一家粮食店,一家煤店。而在成都不是这样,是一家很大的茶馆,代替了一切。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,其需要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。”

但成都人“坐茶铺”,并非都是像闲人雅士一般去“品茗”。他们去干什么?李劫人在小说《暴风雨前》中,向读者展示了民国时期成都茶铺的三大功能——各业交易的市场、集会评理的场所、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。人们在茶铺里打开水、煨中药、炖肉汤。不仅清音、竹琴、川剧、评书能在茶铺里找到舞台,棉纱、布匹、药材、粮油也能



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喝茶休闲。(资料图片)

在这里做成买卖。“袍哥”(四川的民间秘密组织)人家在茶铺里设码头、摆茶阵(一种江湖隐语,用茶杯摆出不同阵形)。有了纠纷矛盾,邀约上一千人“吃讲茶”(发生争执的双方到茶馆里请公众评判是非),断是非。

一方茶铺,不但为三教九流提供了社交、娱乐、交易的场所,也给挑水工、堂倌、戏班、理发匠等小贩提供了持久的生计。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,它“包办”了大众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,成为一道独特风景。

贰

小茶铺里的大时代

当市井的千姿百态在茶香里氤氲,时代的风起云涌也在茶铺中上演。

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,满园绿荫中藏着一家百年茶铺——鹤鸣茶社。两边黑漆柱子上刻着对联:“四大皆空,坐片刻不分你我;两头是路,吃一盏各自西东。”文字中流露出的闲心与豁达正如川人的品格。

安逸、休闲是许多外地人对四川的第一印象。然而,也许人们并不知道,面对民族危亡,爱坐茶铺的川人从未“拉稀摆带”(拖泥带水)。

1911年的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》中,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资州(今资中)小伙子石某刚订婚后,不识文字,以开小茶铺为生。一天他听人在茶铺中读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,捶胸顿足、号啕大哭:“时事如此危急,亡国就在眼前,还讨啥子婆娘啊?我要卖掉家产,拿来全部报效国家!”

1911年5月9日,清政府为了向美、英、法、德四国银行团借款,宣布将商办的川汉、粤汉铁路收归国有,川、湘、鄂、粤四省迅速掀起保路风潮。6月,成都成立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,号召全川人民“废约保路”,组织群众到总督署请愿。9月7日,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,随后下令开枪镇压聚集在总督署请愿的群众,当场打死32人,接着又在成都各路口屠杀群众,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成都血案”。消息传出后,激起全川人民武装反抗。声势浩大的“保路运动”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,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。今天,“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”就静静矗立在距鹤鸣茶社几百米处。



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的老虎灶上正烧着开水。

茶铺,既是传播消息的民间“通讯社”,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大舞台。在四川,茶铺几乎是所有民间演出的发祥地,戏园也从茶铺衍生而来。近代新文化自晚清开始在四川萌芽、发展,茶铺里不时上演追求个性解放、饱含民主思想的新剧。20世纪30年代,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《黑奴义侠光复记》的川剧“时装戏”搬上了舞台。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。在那个信息传递的“慢”时代,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、争取自由的故事,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。

舞台上,川剧、清音、竹琴、评书你方唱罢我登场;舞台下,人间悲喜、国仇家恨在茶汤里翻滚激荡。今天眉山市青神县汉阳古镇,一条静谧的小巷里坐落着老茶铺魁隆昌。吃茶的老人说,当年这个茶铺是当地抗日川军的集合地,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后再未回过故乡。抗战期间,350多万壮士出川,誓死杀敌,64.6万人伤亡、失踪,川军参战人数之多、牺牲之惨烈,居全国之首。

声声喧嚣中,茶铺藏起了无数惊心动魄,也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。

叁

生在屋里活在茶铺

光阴荏苒,几十载风雨后,茶香依旧。透过王笛的研究不难发现,成都的茶铺虽然曾经沉寂过多年,但在改革开放后再次迎来生机,蓬勃发展。

20世纪80年代,成都最著名的生

产资料交易市场当数城北公园茶园里的“周五茶会”。1987年头三季度,茶会上的成交额就超过两亿元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,主办方还把电脑搬进茶园,方便买卖双方搜索信息。

忧心儿女婚嫁的父母在茶铺里征婚,“下海”的商人们在茶铺里谈生意,编辑记者在茶铺里找灵感、碰选题……再不见阔襟长衫的茶客,但堂倌的那声吆喝依然是熟悉的乡音。

今天,在咖啡馆、奶茶店、电影院林立的城市里,茶铺早已从公共生活的“唯一”变成了“之一”,但一代代人沉淀而来的情愫,仍在茶香里弥漫。

出生于1931年的诗人流沙河,年轻时在四川省文联工作,每晚总去单位附近的聚贤茶社打开水,带回去泡浓茶熬夜。在散文集《老成都·芙蓉秋梦》中,诗人如数家珍地写下那些远去的茶铺:瓯香馆、临江亭、广春阁、华华茶厅、吟啸、梁园、三益公……现如今这些茶铺早已湮没在岁月中,诗人也于2019年驾鹤西去,但步入成都的街角巷尾,仍能与一间间小茶铺不期而遇,偶遇低头读书的老者,似有先生遗风。

成都双流的彭镇,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茶铺观音阁至今还保留着张恨水笔下成都老茶铺的样子——不怎么高的屋檐,不怎么白的夹壁,不怎么粗的柱子,若是晚间,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,矮矮的黑木桌子,大大的黄旧竹椅……

茶客有老有少,无论贫穷贵贱,都能在茶铺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。在老板李强眼里,一碗茶面前,人人平等。

每天凌晨4点多,李强就开始生火烧水,准备迎接每天到这里报到的老哥们。老茶客喝茶1元,价格多年不变。虽然少,却让主人与茶客都心安。游客喝茶10元、拍照10元,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走进里间,不打扰老茶客们在外间谈天说地。

茶客中的许多人在这里“活”了一辈子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,茶铺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谢客,门口的监控定格住正月十五凌晨4点19分,95岁的钟大爷无处喝早茶,等在茶铺门外不知所措的身影。

茶铺,沉淀了岁月的沧桑,也聚集了人的温度。

乡土饱经时光摩挲,人生尝尽喜怒哀乐。当年坐在大人膝头上用茶盖儿舀茶汤喝的孩子已是耄耋老人。飞速发展的城市里,只有为数不多的老茶铺依稀还有儿时的模样。但漫步城中不难发现,李劫人的旧居菱窠旁,锦江畔的望江楼下,浣花溪边的花丛间,文殊院的树荫里……成都茶铺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仍在盛放。

从清末算起,成都的茶铺已兴盛了100多年。它如青草生于河岸,自然地长在这座城市的骨血中。天府之国千百年沉淀下的细致、淡定与从容,借着它,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坐上竹椅的那一刻,人们便暂时放下了茶铺之外的纷扰。任这小小的茶碗,如一片扁舟般,带着他们自这生活的河流顺水而下,看着两岸的山河大地,听着不住的鸟鸣猿啼,自在、安稳、笃定地前行。

文图均据新华社